

“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杰

由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研讨会，于 2002 年 7 月 23—27 日在澳门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 120 名学者出席了讨论会，提交论文 100 篇。讨论会取得了建设性成果。下面分列专题予以介绍。

一、关于郑观应的总体评价

与会者普遍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是爱国进步的思想家和成功的、卓越的实业家。作为实业家，郑观应启蒙思想的酝酿、成形和发展，具有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因而成为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先驱。这二者紧密结合，构成郑观应独树一帜的鲜明个性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指出，作为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郑观应提出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一整套构想，是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进步思想家变法自强思潮的全面总括,对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会者认为,郑观应一生总体上是与时俱进的,但仍背负着较重的“传统”包袱。近代启蒙运动的肇始者,都是一批思想上的拓荒者、耕耘者、播种者。但他们刚从旧营垒中脱颖而出,新思想尚未成熟,为了继续在旧营垒中生存,还得经常运用一些传统话语,给自己抹上一层保护色。郑观应也不例外,这是其著作中常常夹杂若干明显与基调不协调的言论的原因。有学者还特别从家族、家庭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论析,认为,作为家中长子,传统的家族、家庭责任感激励了郑观应去谋取个人事业的发展,但事业的成功又意味着他将对家族、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多的承担,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事业成果,异化其对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关于郑观应的思想

政治思想 有学者认为,郑氏改革主张的主体思想是“富强救国”:以大力裁撤机构、淘汰冗员和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内容的政治改革是富强救国的前提;通过倡导“商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和商办工业,以建设发达的近代化经济,是富强救国的保障;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屹立于世界之林,是富强救国的目标。有学者把同光时期郑氏的政治思想定格在“民本与民主之间”,认为郑氏不仅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识地借鉴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推行保驾护航。这一思想特征,既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又是

时代思潮氤氲化生的必然结果。

讨论会对郑氏“以设议会而变革政治”的主张作了较全面的探析。论者指出,郑观应的政治变革思想是19世纪末叶中国独步一时的进步思维,他强调政治上效法西方进行改革并学习科技,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生命力。郑观应主张改革政治制度,除仿效西方“建立宪法”、“开设议院”外,还特别强调“治人”。他的吏治改革思想,包括公举官吏、高俸养廉、监督官吏、裁汰冗员、年老让贤等五方面的内容。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提倡格致,注意新式人才的培养,并设计了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制度和办法,在人的近代化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有学者认为,在主张效法俄、日维新方面,郑观应是与维新派同调的。不同的是,他的变法自强思想只是一种建言与企盼,缺少维新派勇于实践的献身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因而他只是维新思潮中的一位论者,而不是维新变法中的一个斗士。有论者指出,在晚清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郑氏基本持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政治思想,与革命党人倡行武装反清是相悖的。但他没有反对辛亥革命,对袁世凯窃国则予以斥责,表明其尊崇文明、憎厌专制的政治取向。他曾修炼仙道,却与那些因仕途失意而欲入空门或屡遭挫折而寻求精神寄托的人不同,非为己,仍为众,似是荒诞,也让人犹增几分敬意。要之,不能过分苛求其思想的局限性,他的政治思想能对近代三大政治家(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产生影响,其意义非同凡响。

商战思想 论者指出,“商战”一语,最初出自1862年曾国藩的笔下,19世纪70年代以后,从肯定意义上评价西方以工商为先而谋富强的言论开始面世,而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诠释者,则自郑观应始。有学者提出,郑氏的商战思想涉及各个方面,就连他的游历活动也浸润着这一思想。郑观应参与晚清漕运

改革,同样反映了他的“商战”步武“近代化”的理念。郑氏的“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进行“商战”,就是从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需培养商业人才,尤需造就一大批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按世界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

联系商战思想,与会者还对郑氏的商务活动进行了考察。有学者对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认为郑观应参与并为之奠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起了示范作用,诱发华商纷纷投资设厂,对外商起了抗衡的作用,无疑推动了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的步伐。有学者认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他融铁路建设理论和商战实践于一体,其意义已超越了经济范畴。他出任粤汉铁路总办,亲力亲为,为近代广东第一条铁路的建设贡献尤多。

外交思想 有学者阐释了郑观应所提出的外交斗争的系列主张,强调其坚持外交平等的原则,并指出郑观应是使领制度和华侨保护的积极倡导者,其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指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亦不乏局限性:对列强抱有过多的幻想,指望列强遵守国际公法,放弃强权外交,尊重中国主权,帮助中国改革以致富强,同时受君主立宪主张制约,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外交抨击不力。

侨务思想 学者指出,郑观应为侨请命,反映侨情,为侨呼吁及其设馆、设官护侨的侨务思想,使清政府翻新了华侨政策;郑氏主张利用华侨经济,发展商务筹办海防,引起了张之洞、李鸿章等大臣的共鸣,使清政府对华人的态度发生根本的变化,间接促成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对稳定社会治安、平息中外争端及保护华工利益、唤起华工社会的“内向”之心,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法律思想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主张中国加入国际法体系,通过学习西方法律制度,改革传统法制,取得与西方平等的法律地位;提倡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希望通过修订条约,保护中国经济主权,实现富强救国的目的;重视宪法的作用,把立宪作为臻国家于富强的政治保证,对中国法律观念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有学者指出,郑氏的法制主张主要见诸:行君主立宪;开设议院;实行民主选举;改革中国的书吏制度;改革刑事诉讼和刑罚制度;改革民商法制,保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自强自主,与各国平等行使万国公法。学者们认为,郑观应法律思想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全面性(涉及法律的各个门类);务实性(针对实际,解决时弊);求新性(不断提出新措施,对旧制度有所改革);人道性(力主教育、挽救犯人);兼容性(“儒”、“道”、“释”理念与西方学说融为一炉)。郑氏的法律思想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其特征:直观性(观照西方,作出反应,功利性较明显);幻想性(幻想加入“万国公法”后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论者指出,与王韬、薛福成相比,郑观应表现出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更大热情,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更加具体。而郑氏希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断壁残垣上,通过“修补”的方法去建立理想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厢情愿。

新闻思想 此前未见专题研究。论者认为郑氏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不可低估。郑氏的办报思想是近代新闻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表现在:把报刊作为民主政治的枢纽;办报应注重民情;报道视野宜广阔,注重工商新闻和国际新闻;主张由中国人主持中文笔政;建议分门别类创办各种专业报纸;参照西法,制定报律,让官商各自遵守;强调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同时要求新闻从业者增强自尊自律感,毫无私曲,“自抒伟论”。论者指出,郑观应新闻思想的形成,既源于他对泰西各国新闻事业的认知,也积淀着他对近代新闻践履的体悟。他不仅参与了近代上海早期报刊的创办和编

辑,而且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新闻思想反映了那一代社会精英对近代报刊的真知灼见,不但与时人如王韬等互为激励,且给后人许多启迪,在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中都可得窥郑氏的影子。

医学和养生思想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主张吸取西方经验,举办新式教育,改进医政管理,提高医疗水准,是近代中国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有学者还认为,郑观应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古代静态养生观,提出养生必由“修心”始,谓“修心乃入理之本”,可谓得乎传统静态养生观理论的真传。还有学者归结郑观应的养生之道,是以道教养生理论为中心,融入儒家、佛家的养生之术,并吸收西方卫生知识,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而成,其中有不少养生延寿的真知灼见,仍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三、关于郑观应与同时代的人物

郑观应与孙中山 郑孙关系呈现“相异”、“相同”和“互动”的特征。“相异”者,谓前者出身于兼具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的家族,后者则为“贫困之农家子”;前者长期担任买办商人和洋务企业的主管,不愧为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后者则从爱国与变革走向民主革命;他们的年龄悬殊。“相同”之处: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和对外开放的香山;都在青少年时期就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都满怀爱国热忱;都从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中走向变革,希冀中国迅速臻于富强。“互动”者:他们的思想主张有许多重要共识和相同的话语,行动上有互相帮助与支持,只是 1895 年以后,友谊未见持续。尤为可贵的是,有学者把孙氏的早期著作与郑氏的相关文章比较,查出 1 万多字基本相同,从而解析了孙郑思想的传承关系。有学者强调指出,《盛世危言》和三民主义所体现的思想含有对未来中

国体制的不同方案设计,郑观应和孙中山分别向往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同属资本主义的范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难分高下,都是爱国情怀的体现,理应得到后人的肯定。

郑观应与薛福成 有学者指出,郑观应1875年问世的《易言》(36卷本),为薛福成1885年付梓的《筹洋刍议》提供了许多宝贵启示。如二者都在探求中国的“自强之道”,不少篇目都相同,尤其是各自救国方案都奠基在变易历史观的基石上,薛福成的传世名篇《筹洋刍议·变法》,即脱胎于郑观应的《易言·论公法》,系青出于蓝的佳作。薛福成出使欧洲后的晚年论著,又为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提供了重要参考。

郑观应与王韬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与王韬同为近代中国之思想家,同倡改革论调,声应气求,影响于近代维新思想甚巨。惟郑观应之改革思想,乃从中国看中国,而王韬则从域外看域内,是故而不同,又互为表里。

与会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康有为、毛泽东等论题展开了学术研讨。

四、关于郑观应与区域、社群的关系

郑观应与香山 学者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成就及其实业建树,与香山的地缘和人文风气息息相关。郑观应从小受到香山人民反帝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熏陶,受林则徐在香山禁烟气节的感染,出生于买办故乡是他从商的社会根源,而《盛世危言》的成书,则是包括他在内的一批批有着强烈民主思想的香山爱国乡贤苦苦探索的结晶。香山哺育了郑观应,郑观应也“报效”了家乡——他务实进取的精神,勇于开拓而成为揭开中国民主与科学思想序幕的启蒙家的风范,永远启迪着香山后世。

郑观应与澳门 与会学者认为,郑观应探索救国真理的认识之途,既从澳门发轫,又打上了澳门的思想烙印——澳门是郑观应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站,是郑观应融汇多元文化的摇篮,是郑氏巨著《盛世危言》的助产地,是郑氏曾经生活战斗的重要舞台。澳门开放、融汇的地缘环境,多元、进取的人文氛围孕育了郑观应矢志救国的志向,为郑观应成为一代启蒙先师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石。郑观应当之无愧为“澳门之子”。有学者对郑氏所撰《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三大巨著的“澳门情结”作了阐发,认为到《盛世危言》完成时,郑氏的“澳门情结”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升华。概言之,郑氏的“澳门情结”,长怀终身;“公法”信念,持之以恒。

郑观应与香港 有学者认为,郑氏一生过往香港 9 次(当不止此数),时间跨越 25 年。内容可分成操持军务和主办商务两类。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他出色的军务乃是借助其在商务中建立起来的地缘、人脉与才干的优势成就的。香港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强侵略的舞台,从而揭开了他从商、从军“两条腿”报国的人生新篇,这令他引以为豪;香港是郑氏蒙拘半年的“伤心”之地,又令他刻骨铭心。香港蒙拘进一步陶冶了郑氏矢志救国的品格,催生了《盛世危言》的撰写。因之,香港“情结”,促成了郑氏登上“三位一体”(从商、从军、立言)报国成就的高峰。

郑观应与南洋 有学者指出,郑氏在南洋期间,耳闻中外人士所述国际形势及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态势,目睹东南邻海诸邦效西法、行“新政”之现状,这对他的思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郑观应与上海“广东商帮” 有学者指出,上海是广东商帮活动的大舞台,以郑观应为首的广东商帮充当了买办的主角,他们为兴办近代化实业积累了巨大的资本,致力于航运业的近代化。广东商帮对家乡的航运业也相当重视,开办广东沿海口岸航运,同

时在西商难以涉足的中小河道,以小轮船推进了航运的近代化。招商局轮船在广东的营运,不但开创了本国近代轮船航运业在广东沿海贸易的新纪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列强在广东的水运扩张。同时,在精神上对广东商帮兴办轮船航运业也起着鼓舞的作用。

五、关于郑观应的诗歌

以往,研究郑氏诗歌的成果较少。学者们强调指出,此前,郑氏只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实业家扬名于世,作为一个诗人,郑氏却被人们遗忘了,近百年来编选的各种近代诗选,均未选录他的作品,各种文学史更是不置一词,直到1993年4月出版的《岭南文学史》,才有寥寥数句提到他的诗歌创作。这毕竟是不公正的。郑观应的诗现存700余首,比近代诗坛开山祖龚自珍的600余首还多,且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是那些大量反映工商实情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艺术上虽无明显的创新与突破,却展示了近代诗歌的发展动向和时代风貌。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郑氏诗歌中充满了爱国革新的精神,可与《盛世危言》互相参证,互为补充。《危言》多表现郑氏哲人(思想家)的一面,重理性的发挥;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则显示了郑氏诗人的一面,重感情的抒发。两者相辅相成,更显示郑氏人格的魅力。郑观应诗歌的艺术特点,明显受了当时“诗界革命”的影响,《诗草》所折射的思想性、纪实性与功利性,明显与“诗界革命”相符合,郑观应也是“诗界革命”的健将。

六、新史料的发掘

史料发掘最大的兴奋点来自上海图书馆的信息。该馆度藏尚未启封的《郑观应专档》约 5000 件,另外散落在其他近代人物“专档”特别是盛宣怀档案里的郑氏档案,数量更为可观,“专档”加“散档”,计有近万件之多。这批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就其“件数”而言,比已版《郑观应集》所收录的 1300 余件(不含附录)多出 7 倍以上。充分利用这些材料,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郑观应的研究。

还有学者对《剑侠传》、《富贵源头》和《陶斋志果》等史料所作的开发性研究,亦不乏新见。

会议还有不少的兴奋点,继“郑观应研究网站”(http://www.apphcm.org)开通后,将酝酿成立“郑观应研究中心”,即将出版《郑观应年谱》、《中外学者论郑观应》和本次会议的论文集,筹款整理出版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郑观应史料,并组织开展郑观应在上海、广州、香港、澳门、香山等地的专题研究。可以预见,会后,郑观应研究的队伍,将会在新生代“从军”和老学者“入伍”的局面中不断壮大起来。

[作者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 广州 510610]

【责任编辑:杜继东】